

粤港澳电影专栏

《我，就是风！》：
网络时代少儿体育电影的新探索

■文/周文萍

由邓原、潘钧导演，讲述广东云浮独臂篮球少年张家城成长故事并由张家城本人主演的电影《我，就是风！》近日在全国院线上映，影片无论在选题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显示出网络时代少儿体育电影创作上的新探索。

就选题而言，《我，就是风！》从诞生就带有网络基因，选择以张家城为主人公创作影片离不开网络时代短视频爆炸式增长和传播带来的“网红”效应。

随着抖音等的兴起，短视频已成为网络时代人们休闲娱乐、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及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重要形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到10.26亿人，占网民整体数量的95.2%。全球范围内，TikTok注册用户于2023年达到了19亿。

张家城正是在2020年因短视频传播一夜走红的篮球少年。当时他还是广东云浮高村镇中学的初一学生，5月31日，他在珠海观看篮球比赛时与自己高大的专业运动员单挑，单手投入9球获全胜，其单手运球、转身过人、跳跃扣篮等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赢得了满堂喝彩。视频上传网络后，得到了国内外知名篮球明星的关注与转发。6月1日，朱芳雨转发称赞这是他“见过的打球最好的孩子”；易建联转发时写下感言“心，永远都会是身体里最壮实的部位”。而NBA球星库里亲自出镜录制视频鼓励他“请继续发挥正能量，告诉那些认为你不行的人，你可以”。达米安利拉德留言为他加油，塔克留言称想赠送他签名球鞋鼓励他。他的账号收获了上百万粉丝，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

成为“网红”的张家城实现了许多人难以完成的梦想，他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完成了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见到偶像易建联、为CBA复赛开幕式等一系列梦想。他还获得了2020年广东十大好网民故事，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2021年广东省“新时代好少年”等一系列荣誉。电影界也因“网红”效应发现了他的故事，有了《我，就是风！》的诞生。

二

从内容来看，《我，就是风！》不仅像一般体育电影一样讲述了主人公阿

城克服困难追求梦想的故事，也讲述了其特有的在成为“网红”后所面临的烦恼、困惑与选择。

张家城的走红虽然离不开网络传播的影响力，但根源还是其自身顽强的意志和追求梦想的精神感动了全社会。作为一部体育电影，《我，就是风！》自然不缺少对阿城意志和精神的表演。比如片中的阿城在刚开始接触篮球时控球不稳，投篮力量不够，老师对他也没有信心，同学不愿跟他一起打，他就买了篮球在自家楼上看着手机视频训练。他把左手当作右手，运球、俯卧撑、腿部肌肉训练、跑步、蛙跳、投篮等训练一样不少，技术不断进步，终于从自家的楼上训练到了夜里的篮球场，再打到了正式的篮球赛场。此一过程的细致展示揭示了主人公令人感动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影片成功的基础。

然而，网络给阿城带来的并非只有打球获得认可这一件事，在通过网络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影片也呈现了成为“网红”给阿城所带来的烦恼：除了众多想要了解阿城的采访者之外，还有不少看中阿城流量，想让他直播带货的商业公司也纷纷袭来。影片叙述者赵雅竹所在的体育IP孵化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公司因雅竹与阿城的同乡身份派其回到云浮去接近阿城一家人，目的便是让她说服阿城同意签约。这些人和事给阿城一家带来了困扰。从阿城父母最初对雅竹的态度来看，一个又一个外来的采访者和商业公司令他们一次又一次揭开了阿城断臂的伤口，给他们一家人带来了反复的伤害。

影片也思考了“网红”身份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作为动漫设计师，雅竹也曾像阿城一样有过闪耀的时光，但在赢得荣誉之后她的发展之路并不顺利，自身的经历令她对阿城的未来充满担忧。她提醒阿城：“网红”可能转瞬即逝，他必须要做好梦想难以实现的思想准备。这种提醒在一部励志体育电影里或许不合时宜，但其却为影片增添了现实的深度。毕竟欢呼之后，如何继续走下去才是阿城必须面对的问题。据最新报道，张家城目前已上高二，他正在努力学习，希望考到好的大学，在大学篮球场上，“继续打我的篮球，继续去热爱篮球”。此一现实与影片的思考相互呼应，更显示出影片在讲述阿城故事时“为之计深远”的价值所在。

三

该片采用了许多适合网络时代的表达方式。影片的一大亮点是以张家城作为主演来扮演阿城。作为阿城原型，张家城本人主演有许多优势：观众早已通过网络对他非常熟悉，在大银幕上看到就会倍感亲切而容易带入；他自创的独臂花式篮球动作并非其他人能够完成，如果由其他人主演的话也要再由他本人来做动作替身。而另一方面，张家城缺乏表演经验，用他主演带有一定冒险性。幸运的是，张家城以自己聪颖勤奋克服了初登银幕的不足，塑造出了阳光淳朴、大胆追梦的阿城形象，也为影片增添了网络传播的亮点。

动漫融入也是影片的一大特点。片头、片中都有不少以动漫表现的打球的场景，叙述者雅竹本人也是一个动漫设计师。片中最突出的是动漫精灵竹风铃。它的实物是童年阿城从雅竹手里拿到的一个竹风铃，它挂在阿城的窗前，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而在阿城遇到问题 and 困惑时，它就以动漫精灵的形式出现在阿城面前与它交流对话，这其实是阿城内心世界一种外化。为何选择用动漫来表现这个外化？导演说：“无疑，使用内心外化有各种手段，比如心声、比如另一个自己形象的出现等等。但创新的欲望激励着我们，打破平庸的追求支撑着我们”。最终他们采用了动漫这种网络时代青少年最为熟悉和喜欢的方式，使影片更为生动活泼。

“红于网络，却不能止于网络”。网络时代，新的传播方式带来了受人关注的新人物和新故事，如何发掘和讲好这些故事？《我，就是风！》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走走停停》：
人物共鸣与电影自反

■文/雷晶晶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走走停停》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成为这届北影节收获最多的影片。自6月8日上映以来，《走走停停》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口碑，在端午档影片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影片以为数不多的场景、波澜不惊的叙事、适中浓度的情感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真实生活处境。而通过电影的反身性策略，影片也唤起了观众对电影作为媒介的思考。

从主人公的职业设置与电影创作的自我指涉来看，《走走停停》与近两年上映的一些国产影片如《永安镇故事集》《银河写手》，尤其是同样由胡歌主演的《不虚此行》形成了同一序列的呼应。《走走停停》的主人公吴迪（胡歌饰），一个在事业和爱情上都遭遇了失败的编剧，从北京回到家乡，他的选择看起来像是前几部作品的人物在平行宇宙中的某种走向。

只是对于吴迪来说，回到家乡的决定好像并不难，事业与爱情的受挫也没有带来多深的痛苦。但这一形象与近年来影视剧中流行的“窝囊废”形象又不太一样，吴迪不是唯唯诺诺的讨好型人格，也没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高光时刻。他提供了一种有自负但又不多，想躺平但又不能，对爱情有点向往但没有也无妨的“淡人”形象。这样的男性主人公形象在国产电影中是较为新颖的，也会令当下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

吴迪的编剧身份对普通观众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当看到他回老家求职，在超市遇到“别人家的孩子”等段落后，也许会让观众产生一种“他在演我”的普遍认同。就票房而言，《走走停停》相较类似题材的影片收益更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把创作者的问题置换成了更具有普

遍性的问题。吴迪虽身为电影从业者，但他的问题却不再只是创作焦虑，而更多是当下许多青年（或按照影片中高圆圆饰演的冯柳柳的标准来说是中年）的普遍困境，从而容易抵达更多的观众。实际上，吴迪这种自我认知的青年-中年二象性，本身也是当下人们真实处境的某种还原。

影片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是真实且有新意的。初看母亲江美玲（岳红饰），好像是一个影视剧经常出现念叨孩子、包揽家事的母亲形象。但随着剧情的发展，母亲偶尔冒出的几句英语、对音乐的审美、对人生际遇的态度，真实生活与表演的互文等等，让她成为了一个鲜活立体、富有生活智慧的母亲形象。在父亲吴明发（周野芒饰）身上，既能看到传统大家长的影子，但又同时包含着反思与温情。最后父亲借由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参与到拍摄当中，帮助妻子、儿子完成了共同的心愿，也丰富了父亲这一形象的面向。

影片对真实生活的还原也体现在没有刻意去追求一种浪漫爱的表述。吴迪与冯柳柳的互动会让观众建立起情感期待，尤其是借着排练台词，两人半真半假地流露出一些化学反应。但爱情在影片中并没有真正达成，最终只落在了结尾处汽车的走走停停与始终未能交汇的目光。这一段的调度是非常电影化的，也通过调度形成了影片的题眼。在湖边的段落中，当妹妹吴双（金靖饰）和摄影曹哥（甘昀宸）在岸边喂小羊时，我听见后排的观众说“这俩人是不是要好上了”。但到头来什么也都没有发生，因为生活的逻辑本就是这样的，无法处处都洋溢着粉红泡泡。而吴双本身的形象也可以生发出更加多义的解读。

除人物塑造外，《走走停停》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运用了电影的反身性策略。

《凤鸣飞天》：
现代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愿景

■文/黄灵瑶

语“究问”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契合。主创借此呈现出影片的内核：遇到困难时，只要以积极的心态坦然面对，便能凤鸣飞天，迎来新生。

独特的动物视角与奇观体验

《凤鸣飞天》讲述乡村振兴的形式，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乡村振兴题材表现方式，而是另辟蹊径，拒绝陈腐与单调。在以余元雄为主线的叙述过程中，同时选择了被开发的对象“麻鸡”作为独特的第三方视角展开辅助叙事。麻鸡虽是余元雄给家乡带来的致富经，却不是简单的致富工具。导演将麻鸡进行拟人化处理，不仅打破了常规叙事视角，更使麻鸡得以抒发丰富的情感，甚至可以与观众对话。

在余元雄、熊建飞辛辛苦苦开发麻鸡系列产品与培育麻鸡的同时，麻鸡与观众共同见证了他们的行动，亦参与了叙事，甚至作为观众的化身对余元雄的行为进行评价。一方面，观众通过奇特的在场获得了心理上的奇观体验；另一方面，麻鸡说话时幽默诙谐的风格让人忍俊不禁，无形中调节了影片气氛，笑中带泪完成叙事。

通过双向观察，麻鸡与余元雄从一开始的对抗到后来的相互理解、彼此支持，人与动物在情感上走向了和谐统一。本片独特的动物视角在辅助叙事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华传统里天人合一、人、自然、自然造物共处的美好愿景。

生动呈现“五个振兴”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当下中国被频繁提及。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迈进的路上，全面

电影的反身性是指电影通过自我指涉、自我解剖以及质疑自身的生产、表述和美学形式，打破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从而引发观众对电影作为媒介的思考。

在《走走停停》中，电影的反身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电影创作者身份的反思，吴迪的转变构成了这部分的内容。二是考察观看的行为。全片以一部电影作为开场，随着屏幕的后拉，我们跟随主人公来到电影院里，开启了关于观看、创作的思考；而通过对电视纪录片的观看，影片也讨论了媒介与舆论的关系。三是将电影的拍摄过程呈现出来，这部分构成了影片的主体，既包括吴迪一行拍摄剧情片《似是故人来》，也包括冯柳柳掌机纪录片《回故乡的人》的过程。在双重拍摄的交错下，摄影机成为了影片中一个重要的存在物。摄影机一方面参与表意，触发喜剧效果，如吴迪的特写省略掉了精心摆放的书，吴双的特写规避了衣服上的字。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真实与虚构的思考，看似虚构的剧情片，却意外接近了母亲的真实生活，并记录下了母亲最后的时光；而看似客观的纪录片，却通过高度主观性的剪辑成为了迎合流量的“虚假”内容。

母亲离世后，父亲坐在电脑前观看黑白影像素材的段落令人动容。这一画面也指向了巴赞意义上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电影正是通过再现技术，保存时间、捕捉瞬间，将其固定为永恒的影像。父亲后来的参演不仅让影片完整，他与母亲的影像也共同构成了“此曾在”的确定性瞬间，让电影成为死亡和时间流逝的对抗。当身边的一人一离去，只身一人的吴迪在电脑上敲下“走走停停 第一场第一幕”时，生活与影像、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再次被打破，影片也在这里完成了最后一次的自反。

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而从具体路径来看，乡村振兴是要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凤鸣飞天》立足“五个振兴”内涵，并于其中寻求平衡。余元雄回到家乡后，对家乡拥有良好资源却发展相对落后深感惋惜，费尽心力组织人员对当地著名的麻鸡进行养殖与产品开发。一方面，集结优秀的技术人才，从麻鸡的生长环境与鸡苗培育出发，为麻鸡产业提供了好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开发多元的产品链条，独具特色的养生麻鸡煲成为了他美好愿景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将眼光投向了古老的中医文化，亲自上山向老药师学习，开发的麻鸡药膳获得了市场的一致好评。由崇仁相山道家文化延伸出的药食同源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以药膳为切入点展开叙事，是对相山背后人文内涵的生动展现。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影片亦对此做了具体表述。比如村委会为村民们设置了积分奖励，村民如果能做到文明行为，便可获得积分，并通过积分于小卖部兑换奖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遵循。此外，本片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麻鸡生态养殖为重心，将生态振兴落到实处，推动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得益彰。

《凤鸣飞天》是一部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影片，导演通过巧妙的电影表现手法和深刻的现代主题探讨，展现出极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影片对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宏大母题进行具像化描写，讲述青年人如何结合自身特长回报家乡、建设家乡，为如何用视听语言表现主旋律题材、如何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等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份优质的影像答案。